

Q I L U W E N H U A Y A N J I U

2003

齐鲁文化研究

总第二辑

教育部省属高校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编

Q I L U W E N H U A Y A N J I U

2003

齐鲁文化研究

总第二辑

教育部省属高校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编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鲁文化研究. 总第二辑/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编. —济南:齐鲁书社, 2003. 12
ISBN 7-5333-1364-X

I. 齐... II. 齐... III. 文化—研究—山东省
IV. G1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4203 号

齐鲁文化研究

总第二辑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招远市新华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890×1240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2 插页 522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364-X

K·398 定价:35.00 元

目 录

MULU

从新出楚简看齐鲁文化的影响	李学勤 / 1
耶和華的后裔 VS. 黃帝的子孫	李瑞智[澳大利亞] / 3
關於韓國山東華僑族裔認同(Ethnic Identity)的若干問題	韓圭煥[韓國] / 6
齊魯文化在中國早期文明中的多彩展現	王志民 / 8
試論太昊、少昊時代	
——兼論太昊、少昊與炎、黃的關係	張富祥 / 16
秦漢時期齊魯文化的發展及其特徵	王克奇 / 24
齊魯文化與秦漢政治文化的整合	仝晰綱 林吉玲 / 31
齊魯文化與兩漢禮制及禮學	丁 鼎 / 42
略論晉北朝齊魯世族及其文化地位	李伯齊 / 48
青齊清河崔氏與南北學術交流	王華山 / 61
唐代山東土族文化	楊蘭樓 / 68
東夷文化中“仁”的觀念對孔子的影響	劉愛敏 / 76
論易學源於山東	
——兼論漢以來山東古代學者對我國易學之貢獻	楊亞利 / 80
宋元時期山東書院教育的創立與發展	張熙惟 / 86
儒家修身理論及其當代價值	杜景川 / 94
全真道與齊魯文化	牟鍾鑑 / 101
齊地的前道教文化傳統	白 奚 / 108
王處一五次被宣與全真道的發展	趙卫东 / 118
論北宋時期的山東佛教	范學輝 / 128
近代來華傳教士對祭孔的態度	
——從山東大學堂條規引發的爭議說起	王 林 / 137
試析上博簡《詩說》的編聯與結構	江林昌 / 143
上博《詩論》與《毛序》對比研究並論及《毛序》的作期	王洲明 寧 宇 / 152
齊長城修築的文化背景及其防禦戰略	張華松 / 166
隋《龍華碑》及其書畫雕刻藝術	李廣英 / 174
吳質生平及著作考略	易小平 / 180
齊魯數學泰斗	
——劉徽及其數學機械化思想	傅海倫 賈如鵬 / 185
房玄齡家族譜系里籍考	王洪軍 / 189

论黄福

——兼论明代中国文化对安南的传播	朱亚非 / 196
清代曲阜戏剧作家及其作品考述	石 玲 / 202
马国翰著述考论	李梅训 / 209
傅斯年与中国传统文化	王凤青 / 218
山东华拳述论	李成银 刘逢翔 / 224
论山东民俗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	李东成 / 230
西方学者对泰山文化的研究	苏瑞隆[新加坡] / 238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研究评述	杨朝明 / 246
近现代美国儒学研究概述	张 斌 / 253
第一届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富祥 / 259
“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涉及的一些学术观点	刘示范 / 264
塑造和提升城市文化	
——读郭同文等著《鲁迅与青岛历史文化名人》	田建国 / 268

从新出楚简看齐鲁文化的影响

(2003年11月30日在第一届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李学勤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在整个20世纪里,考古学可以算得上是人文学科中发展最快的。20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中,各地新发现的简牍帛书是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些新发现的简牍帛书的年代,大多是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内容极其丰富而珍贵。这对于我们重估古代学术史和认识先秦秦汉历史文化等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前不久公布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为我们展示了战国时代更广泛的学术文化面貌。特别是这两批竹简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的东西,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儒学的源头在齐鲁,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是鲁国人,儒学的主要承传者孟子的主要活动地点在齐国,而他们相关的著作内容在楚国的墓葬中发现了,从中正可了解齐鲁学术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郭店楚简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上博简的年代比郭店简要稍晚一点,但也不会晚于白起拔郢(前278年),其地点也在郭店附近。而这两批竹简典籍的书写时间自然还应该更早一些。出这两批竹简的墓葬地点都在楚国国都纪南城的外墓地范围之内。这样就与儒家著作与学说的流传联系起来了。

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孔子以下直到荀子的儒家人物的生卒情况如下:

孔子 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
曾子 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6年
子思 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
子上 公元前429年——公元前383年
孟子 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05年
荀子 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45年

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后半到公元前5世纪初年的人。其门人七十子下延到公元前5世纪前半,其再传即七十子之弟子在公元前5世纪中晚。到孟子

距七十子之弟子又隔一世,而荀子又晚于孟子一世。郭店简与上博简的下葬年代与孟子活动的晚期及荀子的早年相当,考虑到《孟子》一书及《荀子》一书均为其晚年所作,因而推定这二批竹简的形成均早于《孟子》、《荀子》。也就是说,孟子和荀子均见到过这二批竹简的内容。这说明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儒学已传到了楚国,从而可知齐鲁学术的影响之深广。

郭店楚简中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诸篇。这些竹简内容均见于今传《礼记》等书中,当与儒家的思孟学派有关。《缁衣》取自《子思子》,见于《隋书·音乐志》所引沈约的话。《五行》学说出自子思,后为孟子发展,见于《荀子·非十二子》。《六德》、《成之闻之》内容与《五行》、《缁衣》多相通。而《性自命出》内容与《礼记·中庸》相一致。《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思作《中庸》。”沈约也说《中庸》取自《子思子》。《尊德义》语句或出于《论语》,或类于《礼记·曲礼》,体例和《中庸》颇相近似。上博简也有《缁衣》,还有《武王践阼》、《民之父母》、《子羔》等与《礼记》相关的篇章。

《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在这儒家八个支派中,“子思之儒”的承传关系大体可循。据《史记》等书记载,子思是孔子的嫡孙,曾受业于孔子门人曾子;而孟子又“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荀子》曾将子思、孟子连称,学术界因此有“思孟学派”的说法。过去,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只知道从孔子而曾子而子思而子思之门人而孟子之间的承传关系,但不甚清楚其承传的具体内容。今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出现,正好为我们了解子思学说如何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孔子出生在鲁,曾周游列国,到过河南南部,临

近楚国。孟子出生在邹,也属鲁地范围之内,晚年的主要活动在齐国。郭店简中有《语丛》,多处是《论语》的语句,而《缁衣》、《五行》等与《礼记》相关的篇章都是孔子学说的阐述。孟子读的书大多是郭店简和上博简里的东西。郭店简中的《五行》在马王堆汉墓楚帛书中有,在《孟子》中也有。上博简《武王践阼》今存《大戴礼记》中,在河北平山的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也有。这些事实说明,孔子、曾子、子思等儒

家学说如何从鲁国广泛地传播于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孟子又如何继承总结了这些学术并在齐国讲学传播。从这个角度看,研究齐鲁儒学对于我们认识整个中国先秦秦汉学术史、文化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江林昌教授根据李学勤先生的演讲记录整理)

耶和華的后裔 VS. 黃帝的子孫

(2003 年 12 月 3 日在第一届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李瑞智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

当今全球社会是欧洲基督教过去五百年扩张的结果,它创造了空前的机会与挑战。基督教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一直在全球占统治地位,为全球所共享。为了显示各自的卓越品质,不同价值观念、传统和文化展开了激烈竞争。在 21 世纪的经济建设中以神性信仰为基础的基督教社会和以经验信仰为基础的黄帝社会将采取根本不同的方法。

历史思考

耶和華的后裔包括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他们信仰全知全能、超脱尘世的上帝和创世纪传说、关于亚当、亚伯拉罕和摩西的部落历史以及先验的天神祭祀。犹太教、穆斯林和基督教的传统受到希腊理性主义和修辞学的有益影响。相比之下,黃帝的子孫则忠诚于现实的皇帝,共同分享在长期群居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认同东亚先哲的学识,相信榜样的力量和关于世俗的、现实的领导者的部落历史。孔子的团体精神、老庄的直觉学说、《易经》的相互关联学说滋养了这个民族。

性格思考

耶和華后裔的性格是分裂的,好争吵,富有扩张性,信奉平等主义,追求近乎教条的普遍真理,选拔受大众欢迎的精英人才。他们的性格特点受古希腊讲究辞藻华丽之风、理性的自我宣扬和雄辩术的影响。黃帝的子孫追求统一、和谐、稳定、等级秩序、没有教条的知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品性完美的精英人才。耶和華后裔的性格是建立在思想、逻辑和因果关系上的理性思考,而黃帝的子孫则更多是建立在想像、自律的沉思和错综复杂的关系上的直觉思维。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方面,耶和華后裔的特点是宗教权威、制度的精神性、法律结构、道德诉求和政治扩张。他们在维持大型政治和社会制度结构方面,成绩乏善可陈,只有罗马天主教作为长期的重要机构,积累并完善的制度智慧可说是硕果仅存。没有一个政治实体从帝国的地位没落下去后又重新获得权力。在过去七百多年中,黃帝的子孫靠国家权威、个人的精神力量、典礼结构、品行高尚或知识渊博的人和政治稳定团结起来。儒道精神起了关键作用,儒家思想提供了一种温和而富有智慧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秩序,道家给我们的则是一种对矛盾、对人类奇迹以及对自然力量的独特的个性化的直觉欣赏。很显然,黃帝子孫们历经沉浮,不断地构建中国的政治文化帝国实体。

科学技术

耶和華的后裔发展医学和科学的方法是综合的、理性的、唯物论的、物理的、无个性色彩的和正统的。就像商业和技术被用来侵略和征服偏远地区的人们一样,医学和科学一直被大肆用于侵犯和征服自然和人体。人类成功克服了传染性疾病和阻碍人类活动的自然障碍,同时也发现人体和自然遭到了破坏。变性疾病和生态恶化是食品加工中造成营养成分被破坏和对资源进行过度的工业和商业开发的结果。黃帝子孫发明的医学和科学更具个性化,具有朦胧、随意性、精神性、关注能量流、个性化和非正统特点。这一传统培养了人们对推动人体和自然的能量流的敏感性,探索了运用医学和科学使之与生命秩序和谐的方法。如约瑟夫·尼达姆所说,道家披

着神秘的外衣,与科学并无敌意。

当代医学与科学

当今现实

当今世界,耶和华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后裔从基督教五百年的商业和军事征服的历史、三百年的科学启蒙历程、二百年的工业领先历史 and 一百年的思想扩张历史中受益匪浅。面对 21 世纪的混乱和复杂局势,他们在逐步迷失方向。本世纪初,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奉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策略看起来很快将消耗掉它的势力和权威,其失败的关键是文化的自鸣得意,这将使它在制度上无力击败和操控东亚社会。黄帝的子孙受益于过去五十年的经济复苏,受益于过去五十年通过提高服务质量重获征服地位的政治战略,而这一战略源于七百年的中国经验、对中华文化及文明的信心的苏醒、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理想的实现和道家的聪明才智。他们能够学习二战失败后日本奉行的战略方法,夺取了美国在高科技、物质资料、零部件及制造业等领域的龙头地位。

历史遗产的当代影响

耶和華的后裔不断受到诸如十字军东征、讨伐异教徒、种族大屠杀(沙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教徒的)宗教裁判所和大毁灭等历史事件的困扰。几千年来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虐待和犹太教不屈不挠的抗争,过去五十年以色列的苦难和混乱不断加剧,使危机不断恶化。受《圣经》休戚与共观点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者与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者发动了针对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现代十字军东征,威胁要消灭美国。由于美国外交效率低下,连续几届领导人没有或几乎没有历史意识,造成了目前的困境。黄帝的子孙面对富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民主的基督教世界、贪婪而自私的消费者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缺乏,采取了文化漠视的态度。无论在商业、医学还是技术方面,沉思的传统、社会约束力、政府领导水平、长者统治和灵活而又连贯的战略目的为东亚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他们在审视基督教社会时不掺杂任何宗教热情,在评估如何利用西方军事野心的弱点、消费者的放任自流和民主理想主义时,不受《圣经》思想遗产的束缚。

耶和華的后裔发展了医学与科学,借助专利使之制度化,注重引导出普遍理论。经济繁荣时期,血液循环、癌症、肥胖、糖尿病、过敏症等变性疾病的发生导致健康危险指数上升。手术、药物、食品加工、动植物基因工程和自然资源的再配置无情地破坏了自然的和谐,人类开始付出持续高昂的代价。科学已经成为商业利益的俘虏,信息腐败,技术仅为自身的利益而进行革新,降低了它应向人们提供的服务质量。黄帝子孙发展的医学与科学传统呈现出个性化、非系统、大众化、独立性等特点,受《易经》中复杂知识的影响很大。道家自然观对近代西方科学的许多过度行为提出警告,他们据此自发地提出并解决问题。火药发明后,中国没有广泛用于战争,而在西方用于战争却成为时尚。当然,在 20 世纪东亚各国为重新获得自治能力和决定自身文化身份的自由时,效仿了西方许多做法,取得了斐然成就。但是如何分清西方科学有益和有害的影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当代政治

耶和華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后裔的政治体制认同希腊理性主义的传统,追求民主、个人主义、平等主义以及以消费为中心的全面自由。自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具有盎格鲁血统的美国民主、人权、法治、市场自由等一系列价值观被宣扬为普遍美德,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尽管这些观念的确有价值,但是当它们与权力霸权行径为伍、不遵守游戏规则时,它们的价值就大打折扣,这更坚定了许多民族信仰、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东亚社会只是在不同程度地表面坚持这些价值观,而各自的传统价值观念却在谨慎地被保护、滋养和发展下来。黄帝子孙的政治体制是儒道思想的阴阳平衡,是一种官僚政治,倡导共产主义,以生产为中心,追求内心和精神的自由。当从对最初西方的侵略感到震惊中调节过来后,他们在调和西方的需求与保持他们自身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表现出了卓越智慧。深邃的历史和非凡的聪明才智起了关键作用,而那些没有这些文化财富的地区却无法抵御西方力量、压力和政治宣传的入侵。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未来几十年,中国探求独立于西方期望与偏见的政治模式的努力将在国际

政治舞台上增加一极,在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模式之外还会促使出现另一种模式。

现代社会

耶和華后裔所处的社会经济持续停滞不前,负债增加,发生种族和社会急剧变革的可能性加剧,他们在努力保持教育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工业竞争水平持续下降,一些社会困境日趋明朗。这表明,在人类社会,强权一方经过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特权,当弱势一方动员全部力量作为强权一方的竞争对手出现时,挑战必然出现。如何迎接挑战,民主制度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过去五十年的历史表明,盎格鲁-美国式的民主对东亚社会所实施的策略是脆弱的,因为东亚各国从儒家政府官学合一的传统中汲取经验,那就是把国家的责任让由精英人才组成的官僚机构来承担。黄帝子孙所处的社会能应对经济变化,保持种族和社会稳定,致力于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技术和工业竞争力。他们的成功来自由精英人才组成的政府机构,他们被赋予设计国家发展战略的责任。

当代社会困境

基督教和犹太教社会的媒体、学术界和政界往往误导大众舆论,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怎样做更好,

也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学术、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既得利益。虽然近年来互联网信息量极其丰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现状,但是能理解这些知识的只是相对少数人。澳大利亚是一个同时受制于欧洲历史和亚洲未来的国家,如果不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国或欧洲,它可能更容易适应这个世界。为了国家利益,对高级外交官、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们加以教育,他们就能更好地管理那些封闭落后的人们,人们的行为就更容易受齐鲁文化传统中儒家和道家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较少受齐鲁文化影响的国家要理解这个世界的千变万化可能会花更多时间。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政治、社会、生态和医学问题,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和齐鲁文化价值的复兴适时发生了。

与1929年相比,美国经济负债增加,更加脆弱,浪费更严重,但是荒谬的是,日本和中国都有兴趣支持美国经济。当经济泡沫破灭时,其威力将史无前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终结的方式。全球秩序的重建将会更加关注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幸运的是,体现在儒家和道家传统中的文化品质看起来比当今全球社会中任何一种竞争文化都能更好地应对这一进程。在经历了几个世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危险的变化后,齐鲁文化能让我们预见一个世界秩序的治愈期和恢复期。

(山东师范大学外事办公室周连勇编译,未经作者审阅)

关于韩国山东华侨族裔认同(Ethnic Identity)的若干问题

(2003年11月30日在第一届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韩 圭 焕

韩国翰林大学教授

几千年以来,韩国是朝贡中国的国家之一,这次坐飞机走的那个道就是贡道。我小时候听爷爷说,你如果到朝鲜的京畿道的长山岬,就可以听到山东半岛石岛的公鸡叫。这虽然是开玩笑,但爷爷这么讲是为了表示那里与山东半岛很近,距离就等于济南到烟台的三分之二,飞机起飞只需要四十五分钟。

在一千多年前,有个日本人圆仁写了本《入唐求法记》。他在那本书里写到,从山东到扬州的运河沿岸,有许多新罗人开的新罗坊造船。唐僖宗时期,韩国人崔致远在山东登陆,到长安去考科举。他十二岁来,十八岁中科举,曾任县令等官职。而现在,韩国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人数在世界上最多,在中国留学的韩国学生数量已经多于日本人。

齐鲁文化也是我们韩国的文化,因为全世界用一个姓两个字的名字的人只有中国人与韩国人。在韩国,齐鲁文化本身就被认为是自己的文化,并不认为是外来文化。从本质上说,齐鲁文化也就是儒学,也是古代韩国的东西,即韩国文化也是齐鲁文化。中华文明之于韩国的密切关系可以从诸多方面加以体现。如李姓至今在韩国众多,而历史上从济州岛到扬州、到西安,新罗人是熟悉路途的。当时有的日本人想到中国来也得求助于韩国人。

我自己现在的课题是研究韩国山东人的民族性。我认为山东人非常特殊。在“壬午之乱”时,清朝派人到韩参战。到韩国后的这些人本来是汉族,但到后来,特别是山东人及其后裔就变为一个种族,近似于闯关东的山东人。他们因亲属、血缘等有归属的天性。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你是山东哪儿的?第二句是:你是什么时候来的?而且这种归属感还有虚荣心。为了保持这一状况,他们结合当地的情况,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雇佣山东老家的亲戚或乡邻,而不雇佣韩国人、日本人。刚去韩国时,他们有政治上的优越感,强烈地保存着山东人自己

的特点。他们是精明的、经营有方的人,不是一般的劳动者。比如商人的经营方式靠的是信誉,不立字据,经营权与所有权完全分离等,这些很先进,韩国现在都做不到。因此,他们在不到十年之内就赶上日本人花费数十年方才达到的经营份额,其贸易比重逐渐与日本人平分秋色。而当韩国作为清朝的藩属秩序已经被日本拖到西方秩序的边缘时,在韩华侨开始努力保持自己的特色。他们本来政治上有很大的实力,可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清朝势力完全撤退,剩下的就全是经济实力而不是政治。当韩国变成日本人的以后,华商除了有限的经济条件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优势了,而随着时间的消逝,这种优势也逐渐丧失。一般来说,一个种族在异地生活,当政治地位高、经济地位垄断时就好;当政治地位下降、经济地位依然垄断时,也还比较好;可当政治地位消失、经济地位下降时,他们的惟一出路就是离开。

从清末起,山东劳动者开始到韩国劳动是季节性和流动性的,而且女性少。后来,男女比例由女少到多,而这批人也开始当地化,标志着这一族群开始有了自觉的居留意识,但仍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如在80年代以前,他们绝不与韩国人结婚,保持着自己的饮食习惯、婚丧嫁娶、经营信用及风俗习惯。而80年代以来,一些青少年已经习惯了韩国化。越是青年,越不在乎嫁给韩国人或娶韩国人;但老人不改。到现在,很多意识与习俗都消失了,如宗主国地位意识、华人优越感、落叶归根、迷信习俗、排斥韩国人等都没有了。

总之,山东人在韩国的一百年中,写下了曲折万状的华侨史,从文化人类史的角度研究19世纪末山东人的社会文化,韩国华侨社会是非常宝贵的社会素材。因此,韩国政府应该保护非韩国种族群,任何歧视、刁难他们的政策和做法,都是违反历史、违反文明的行为。韩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在海外的

500 万韩国侨民的利益,那么也应该保护在韩国生存谋生的因各种原因和各种渠道、被无奈的人命运所驱而来到韩国的人。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李梅训博士
根据韩圭焕先生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齐鲁文化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多彩展现^[1]

王志民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齐鲁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早期也具有独特的地位, 曾经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丰富的地下文化遗存与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 都展现出齐鲁文化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特异风采。

关键词:齐鲁文化; 中国早期文明; 多彩展现

中华文明以其历史悠久、幅员广大著称于世。因其悠久, 现代文明实为早期文明的延伸、发展与创新; 惟其广大, 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了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而正是这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 形成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多样统一的特点。

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早期, 具有其独特的地位, 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一地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是中国东方一个影响最大、发挥了独特作用的文化中心,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推动和影响中国发展的进程, 展现出特异的风采。

一、史前时期——中华文明形成的基地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探索, 是国内外学术界、考古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著名先秦史家徐中舒先生认为: “秦汉以前, 齐鲁为中国最高文化区, 必有文化上的凭借。”^[2] 而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七八十年中, 山东地区考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 展现出齐鲁地区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1、“城子崖”的宣示

20 世纪 30 年代初,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队对现今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

遗址进行了挖掘, 其出土的大量造型优美的黑陶器令人叹为观止, 尤其是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之誉的蛋壳黑陶和发达的轮制陶艺技术, 更代表着山东龙山文化时代先民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城子崖〉序》中就高兴地宣示: “凡此一切都给予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暗示, 就是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紧要的成分, 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此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通过城子崖和其他龙山文化的考古挖掘, 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 认为“公元前第三千年期间, 特别是其中、晚期……形成的龙山文化群体, 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地”^[3]。

2、自成体系的山东考古文化系列

城子崖挖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 山东和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针对龙山文化的来龙去脉, 作了大量考古挖掘和研究工作, 探明了山东地区史前文明的发展是沿着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序列自成系统发展的。其进一步证明: 高度发达的龙山文化不是来自其他地区, 更不是来自海外, 而是在由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独立发展形成的, 是源远流长的, 是有着深厚根基的。标志着这一地区应该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

地之一。

3、中国文字在山东地区的最早出现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文字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过程才发展到甲骨文那样的相当发达的文字系统,而在这个漫长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与年代较早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直接的关系。在山东地区,除在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有刻画符号的龙山文化陶片外,其后又在邹平县丁公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十一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而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挖掘的灰陶背壶上,就发现了有用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更有人认为在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所发现的刻画符号“是我国古文字学界公认发现最早的文字”^[4]。

当然,是否真如有的专家说的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所发现的刻画符号就是我国古文字学界公认发现最早的文字,尚有待考古界在今后的挖掘和整理中继续证明。但是,早至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在文字形成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就表明了这一地区确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4、龙山文化城市群的发现

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走向阶级分化的反映,它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在山东地区出现之早、之多,亦集中反映了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水平之高。近二十年来,山东考古界对城子崖遗址不断地钻探、试掘和研究,公认它是三个阶段的古城遗址。其最下层是一个山东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另外,又先后在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了一个十二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在临淄桐林遗址发现一个十五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在寿光边线王遗址发现了五万平方米的城址等一系列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更值得提出的是:近年在山东五莲县丹土遗址进行的考古挖掘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城址。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距今4800年以上……在龙山文化中期城,人们发现了比较清楚的蓄水池、排水沟和出水口等设施”^[5]。这不仅将山东地区城市的出现提前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而且进一步证明了龙山文化时期城市功能的齐全和筑城水平已相当高。凡此种种进一步标志着山东地区史前文明发祥之早、之高。

5、金属器在山东的最早发现

就金属的使用讲,虽然目前只在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铜器,似乎还不够普遍,但从商代铜器在山东各地大量发现的情况看,有的专家提出了“龙山文化时期金属的存在与运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6],只是目前挖掘出的较少罢了。山东金属器的出现,与甘肃齐家文化及辽宁西部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的红铜器,都属于时代大致相同的最早发现。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他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黄河流域是早期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长江下游是另一个中心,山东地区文化的发展自有序列,是与黄河中游相对的另一文化圈,这三个地区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关系最密切”^[7]。当今山东地区确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而这也正是齐鲁形成先秦最高文化区的深厚基础和文化先导。

二、商周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

根据考古学界一般的看法,“岳石文化是介于山东龙山文化与二里岗上层早商文化之间的考古文化……基本上处于夏代的纪年之内,因此岳石文化是夏代山东地区的文化”^[8]。就目前情况看,对岳石文化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证明和研究,山东地区夏代情况可信的文献资料亦缺乏,因而夏代山东地区的文化展现及其在夏代文明中的地位可留待以后再论。

1、商代东方文化中心区

傅斯年先生在其《夷夏东西说》中曾说过:“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9]笔者认为,这一个重心,在高度发展的史前文明的基础上,大约在有商一代已经数次展露端倪。

商代山东地区的文化面貌,尽管文献难征,但随着20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与商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山东商文化的面貌、山东与商文化的关系都逐步显露出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就在他著名的《说亳》一文中,提出汤都在亳,而亳即为今山东曹县一带^[10]。在此后,傅斯年先生又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进一步肯定了王氏之说:“王国维君证汤之亳为汉之山阳郡薄县(今山

东曹县境),以《左传·哀公十四年》‘宋景公曰,薄宗邑也’为证,其说至确。^[11]”

王、傅二位先生关于早商时代曾建都今山东境内,或者说今山东地区应为早商文化的一个中心区的观点,被此前此后诸多学者从文献和考古所得的资料中反复证明,并将中心区域的范围扩大到泰山南北乃至全境。徐中舒在《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中也提出:“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遗物有咸水贝与鲸鱼骨,即殷人与东方海滨一带交通之证。秦汉以前齐鲁为中国文化最高区域,必有文化上的凭借。《左传·昭公二十年》述齐国的沿革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这个传说必含有若干可信的史实在内。我以为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去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篮。”^[12]著名考古学家唐兰则提出:商“最后迁的一个都是奄。……那就是由曲阜一带向西北渡河到安阳”^[13]。著名甲骨文及商史学者胡厚宣先生在论商文化中占卜之来源时曾说过:“殷人袭东方之黑陶文化,仍行占卜,并大加革新。”这里黑陶文化即指的龙山文化。胡先生意在说明:山东龙山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源头^[14]。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在他的《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对龙山文化尤其是山东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关系亦曾有很深入地探讨,提出了十分精到的见解。他在《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一文中引述李济先生“曾推测殷商文化的基础乃是山东的龙山文化”^[15]之后,通过若干考古资料分析指出:“殷商的统治者,亦即子姓的王朝,是来自东方的一个政治集团。”^[16]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在山东青州苏埠屯等地发掘出了大量的商代墓,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和其他随葬品,使我们对山东商代文化的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应该说明的是,2003年3月间,在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卜甲,这个被李学勤先生称为“具有界标意义”的“历史性重大发现”,震惊了我国考古学界,认为“这是自殷墟首次发现甲骨文104年后的第二次发现”^[17],证明这一带很可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文化中心。

综合山东商代文化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推断:高度发展的山东龙山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山东地区在早商时期即是商族活动的重要区域并在此建都,山东在有商一代则是一个商文化发达的中心区域,而大辛庄、苏埠屯等地方则

可能是影响巨大的商文化活动中心之一。

2、“周礼尽在鲁”

西周初年,姜太公与周公旦这两位文化巨人的东封齐、鲁,为这一地区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此后至秦统一的大约八百年中,齐鲁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山东地区)一直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心,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引领着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方向。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8]我国早期文明至周最盛。正如杨向奎先生言:“‘郁郁乎文哉’的周,使夏商以来的传统文明发展到新的顶峰。”^[19]这个以礼乐文明为突出特征的周文化的设计师和推行全国的“始作俑者”正是周公。《礼记·明堂位》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而以其子伯禽代就封地的鲁国,就成为周公着意经营的东方周文化中心。大约在周统一全国之后,鲁国的地位就在不断上升。据《左传·闵公元年》:“齐桓公问于仲孙湫曰:‘鲁可取乎?’仲孙湫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可见即在春秋初年的齐国,也公认是鲁秉周礼的。而据有关资料证实,至迟在春秋末期以前,其周文化中心的地位就已有很深厚的积累。《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礼乐之盛,即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周初封建,“以蕃屏周”,晋、鲁同为周之宗亲,晋、鲁相较,晋国是距离周室最近、势力最强大的宗室大国,然而晋卿使鲁,亦盛赞“周礼尽在鲁”,可见鲁为周文化中心的地位。

而就在此前不久的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鲁国的师工将各诸侯国之《风》尽数演奏,将歌颂周之先王和业绩的《小雅》、《大雅》歌诗亦一一奏来,季札“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最后竟忘情地感叹:“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20]周王室之雅乐及各诸侯国之俗乐都集中于鲁,而且让人叹为观止,可见周之礼乐文明,鲁为集中代表。

3、齐桓称霸与文化霸权的展示

与鲁国以礼乐文化展示其中心地位相映成辉,齐国在春秋时期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其文化面貌,这就是盛极一时的齐桓称霸。所谓“齐桓称霸”,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展示,而对此认识最早的应是

孔子。其于《论语》之中,三论管仲,而两赞其文化霸权:“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1]这都是着眼管仲在文化上的贡献。

观齐桓霸业,征伐与盟会是主要形式,而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其目的却在文化。首先是征伐:一是伐楚,理由是“尔贡苞茅不入”^[22],实际目的是在尊王的招牌下推行文化霸权;二是北征戎狄,曾“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23],目的还是为了遏制北方落后民族对中原先进文化的掠夺性破坏。着眼点都是文化捍卫与推展。其次是盟会。《左传·僖公七年》曾记载管仲对盟会内容的概括是“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孟子·告子下》则记载了葵丘会盟的一些具体条款:“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先。’”其主要约法也是政治、文化的信条。所以清代学者马骥总结齐桓霸业的盟会是:“衣裳兵车之会,大率尊天子而亦信义。”^[24]

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的称霸事业,从当时的时代意义讲:荆楚受盟,刑、卫重封,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是“在‘尊王’的旗帜下,把当时中原的诸侯国组织起来,并逐渐消除诸侯国之间的界限,这是统一中华民族的一个步骤”^[25]。而从齐国自身而言,则是将齐的文化观念和政策推及各诸侯国,是一次文化霸权的充分展示,是齐国国力与文化之盛的具体表现。

4、诸子大半出齐鲁与百家争鸣于稷下

战国诸子学术的繁荣,是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臻于极盛的重要标志,而其发生、发展之中心区域即在齐鲁之地。其一,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半出于齐鲁或受齐鲁之重大影响。《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孔、孟与墨子都是邹、鲁之人,已为不争之史实;儒家另一大师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即游学于齐之稷下,曾“三为祭酒”,“最为老师”^[26],其学术亦成于齐国。道、法两家之代表人物老、庄、申、韩虽皆非齐鲁之人(庄子为现今山东东明县人,地近齐鲁),但道、法思想之产生却与齐国有密切关系。《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列伊尹与太公(姜尚)为道家之首,也将《管子》列入道家著作,反映出在老、庄未出世前,道家思想萌芽发展的轨迹。事实上,多有学者认为道家之学源出齐太公对商代伊

尹之继承^[27],而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黄老之学”的形成与发展则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完成的。齐人田骈及一大批齐之稷下先生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后世法家多出秦晋,但法家与齐国的关系却源远流长,甚为密切。一是学术界多有论者提出:法家与兵家同渊源于殷周之际的兵家始祖齐太公;二是春秋时期“孕育法家思想先进基地的,一个是齐国,另一个是晋国”^[28]。

管仲是一位法家的先驱人物。齐国有一个管仲学派,号称齐法家,其思想大多集于《管子》一书中。荀子的思想及理论体系受到了齐国法家学说相当强烈的影响,而正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完成了法家集大成的任务。其余各家学派,大多著述已不传,但就目前考知:战国阴阳家之代表人物邹衍、邹奭都是齐人;名家之公孙龙曾游齐之稷下,而宋钘、尹文、田巴等名家学者则都是齐之稷下先生。

战国学术文化之中心区域在于齐鲁,还与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置有更直接的关系。田齐统治者在齐国都城临淄一带,“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29],人数曾多至“数百千人”^[30]。稷下诸子自由争鸣,百家理论各现稷下讲坛。被称为稷下先生著作总汇的《管子》,即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被郭沫若称为“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31],并认为当时的稷下确实“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32]。

5、儒墨“显学”俱出于鲁

战国诸子之中,儒墨两家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即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就其共同特点看,一曰弟子众多。所谓:“孔墨徒属弟子,充满天下。”^[33]二曰支派林立。世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34]三曰影响甚巨。《吕览·当染》赞其“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四曰品次极高。儒家之中大师如孟子、荀卿者流,俱为中国文化巨人;另有七十二弟子,亦个个为圣贤;墨家学派尽管在秦汉之后,淡出主流显学地位,文献散佚,史载阙如,但勾稽典籍,披沙沥金,亦能见出如公输般等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明星。至如孔子与墨子,其思想可谓与日月同辉,照耀中国文化数千年。孔子独尊,后世有“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尊和“至圣先师”之誉。就是墨子,虽秦汉之后一直消沉,几成“绝学”,然而也曾几经复兴。百余年前,外寇入侵,西学传

人,民族危亡之时,墨学就颇热闹非凡。不仅有人说:“西人天学……究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35]且有人发出:“假使今日中国有墨子,则中国可救。”“今欲救之,阙惟墨学。”^[36]

就儒、墨两家观之,其称“显学”,实为两大品次极高的智力集团:儒家重教育,主要培养精神之贵族;墨家重实务,则主要培养科技实用型专家。前者开中国教育先导,达中国哲学生人文科学之顶端;后者实开中国科技教育先河,代表那个时代中国自然科学发展之高峰。

中国早期人文科技之双峰,为何俱出齐鲁而不及他邦?(孔、墨两派之长成、发展,与齐关系亦极密,兹不详论)我认为最主要的成因就是齐鲁为先秦最高文化区,丰隆的高原方能托出横空出世的双峰。

6、先秦兵学最盛于齐

兵学发达,为先秦文化一大特色,但其辉煌成就却多为齐人所创。中国古代兵学号称有十大兵书,先秦时代就有六种,即:《六韬》、《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吴子兵法》、《尉繚子》,而前四种皆为齐人所著;北宋神宗年间,官修《武经七书》亦将《六韬》、《孙子兵法》、《司马兵法》列入其中。《孙臆兵法》在《汉书·艺文志》中以《齐孙子》著录,《隋书·经籍志》不录,大约隋以后失传,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臆兵法》的残简,则进一步证明了该兵书在汉代就存在。而事实上,先秦兵书出于齐者还不止以上数部,《管子》、《荀子》、《鲁连子》等书中都载有重要的兵学内容;《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子晚子》一书,班固自注曰:“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大约也是一部齐人的言兵学为主的书。齐人中的军事家,除享誉世界的孙武外,像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臆、田单,乃至田忌、齐威王都是卓尔不群,照耀中国军事史的。我国先秦时期,尤其春秋战国五百年间,列国争霸,诸侯称雄,兵学之盛本不为奇,但众多军事家与兵学典籍多出于齐,则反映出齐国悠久的兵学传统和深厚的兵学根基。从军事文化的层面展现了齐鲁文化在先秦各地域文化中的地位之高。

纵观有周一代,齐鲁所出文化名人之众,传世典籍之丰,确非他域可比;而春秋战国之世,前有鲁之礼乐,后有齐之稷下,海内文人向往齐鲁,趋之若鹜,实为当时华夏文化之中心,学术思想之源泉,人才培养之基地。

三、秦汉时期——帝国政治的思想源

齐鲁文化在战国末期的发展并未因秦的统一而黯然消亡,而是在新的大统一帝国的形势下,焕发出新的光彩,深深影响着秦汉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1、秦始皇对齐鲁文化的迷恋与怨憎

大约秦始皇这个偏居西方一隅的关中主宰者对齐鲁这个东方的文化圣地早已十分向往和迷恋,所以他在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全国后,对齐鲁文化给予了最大的关注。概括讲,可用他的三个“最”来描述。一是他最迷恋齐鲁大地的人文和山水。他在全统一后的十一年中,只有四次大的巡狩,但有三次是东巡,而每次都以齐鲁为中心,他最后是死在齐鲁大地上。秦始皇几乎踏遍了齐鲁的名山大川,走遍了山东半岛的海岸线。史学家王仲荦先生说秦皇东巡,除会稽外,“主要的海上活动,是在琅琊台、成山角、芝罘以及昌黎的碣石山四个点”^[37],而前三个都在齐鲁。二是最相信齐鲁方士的谎言。他听信方士“不死之药殆可得”^[38]的说教,“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39]。他的轻信方士之言,造成了“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趋咸阳者以千数”^[40]。三是最憎恨齐鲁儒生,但出于个人“私愤”也是重要原因。统一之初,秦始皇对齐鲁的儒生是关注和重视的,其“东行郡县,与鲁诸生议望祭山川之事”^[41]即是证明。然而由爱到恨,最终演成“焚书坑儒”的惨剧,一方面反映出齐鲁文化与秦晋文化、儒学与法家思想尖锐的对立,另一个重要原因应是儒生固执的偏见和迂腐的“冒犯”以及方士的欺骗,导致了这位刚愎自用的暴虐君主将一部分儒生、方士“坑”掉。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42]而从文化的影响看,也折射出齐鲁文化对秦代政治的影响力之大。

2、汉初统治者对齐鲁文化的重视和阐扬

齐鲁文化对汉代在政治、文化乃至经济方面的影响之大,尤以汉初为最。在从高祖至汉武帝时期的近百年间,齐鲁作为最高文化区的优势风貌进一步显露于世。

其一,刘邦开封建帝王祭孔之先。汉家起于楚地,高祖刘邦又是一个“谓读书无益”之人,素对儒生